

产经文库

干春晖 主编



GUOJI

郑若谷 著

WAIBAOCHENGJIEYU

ZHONGGUO

CHANYEJIEGOU

SHENGJI

国际外包承接与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产经文库

干春晖 主编

国际外包承接与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郑若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干春晖主编;
郑若谷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产经文库)

ISBN 978-7-208-14085-1

I. ①国… II. ①干… ②郑… III. ①对外承包—研
究—世界 ②产业结构升级—研究—中国 IV. ①F746.18
②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826 号

责任编辑 汪 娜
封面设计 夏 芳

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郑若谷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230,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85-1/F·2408

定价 38.00 元

《产经文库》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促进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但这种以扩大规模为特征的外延发展方式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被动的调整状态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克服产业“瓶颈”和填补产业“空白”,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提高产业效益,但“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困境没有根本解决。长期以来,靠低成本制造及出口、大规模开发与建设、排浪式消费等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不断扩大,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无法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升级之后的需求结构相匹配,部分行业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表现为一方面某些领域巨大的内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说,供需之间在结构上严重不匹配,这种资源的错配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效率。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进入到6%—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而且,还有继续向下的压力,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内在结构的变动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为了使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持续增长,新的增长动力必须向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为主转换。

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的现状,实现增长动力多元化、均衡化的目标,深入发掘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将新改革与经济转型进行耦合,从而建立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地位。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以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应该从世界经济强国和大国地位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这需要在全面深化内部改革的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在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非典型”增长阶段,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制度障碍不断凸显,呈现出了“最典型”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迫切需要在这种“非典型”增长阶段、“最典型”转型升级下,成功地跨越“转型陷阱”,为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在通过打造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转型;在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调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积极突破制约高级化的约束条件;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上,重点要实现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同时加快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产业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在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通过消费需求升级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重点要设计提高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机制,同时要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上,重点以领导型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化市场为载体构筑有竞争力的国家价值链,同时通过海外合作与收购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对接融合。

产业经济学科在上海财经大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厚实的发展基础,该学科前身为工业经济学,始于上海财经大学“文革”后的复校之初。该学科在中国产业经济学泰斗杨公朴教授的带领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奠定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之后,产业经济学科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及政策两个大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和团队成员主要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并重点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三年前,我们以上海市和财政部的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学科支撑,整合校内外的研究团队、决策咨询专家,与企业 and 政府部门紧密协作,在上海市教委与上海财经大学的支持下,以原来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培育的产业经济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秉持“国家急需、创新发展”的理念,对接新改革、新开放背景下国家和上海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中的重大问题与战略性问题,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研究院追踪国际产业经济学前沿发展趋势,拓展产业经济学学科研究领域,研究解决改革中的产业经济新问题,特别是从战略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先后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研究基金课题和政府委托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课题,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波动关系”、“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近年来,在国际 SSCI、国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一系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优秀成果奖项,并为国家和上海等地方政府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分别获得国家 and 地方领导人的好评,起到了很好的决策咨询作用。为了使这些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出版,贡献于国家与上海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我们选择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出版。

我们想借此契机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选择团队成员近期的部分理论研究成果,以《产经文库》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近期计划推出两批,第一批以学术著作和理论研究论文为主,第二批以项目研究报告为主。除了不久前已先行出版的《居民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王宇博士著)之外,第一批拟出版 5 部,包括《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结构、制度与战略》、《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电子商务产业链治理及升级路径》。其中第一部是团队成员近年来相关经济转型升级主题研究的工作论文集,这些论文都已相续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第二部著作基于郑若谷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三部著作由王健博士撰写,内容是从制度环境维度研究中国产业如何构建新一轮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第四部著作由李津津博士撰写,讨论了在自贸试验区实行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及其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价值;第五部由正在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的王法涛撰写,讨论了电商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和升级路径。

干春晖

2016 年 6 月

目 录

《产经文库》总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4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4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述	8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	12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17
第一节 有关国际外包的研究综述	17
第二节 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25
第三节 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发展的理论基础：分工	31
第三章 国际外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机制	45
第一节 国际外包与产业内结构升级	45
第二节 国际外包与产业间结构升级	56
第三节 本章小结和评论	73
第四章 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	75
第一节 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演进与特征	75
第二节 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结构性因素：总量测度	86
第三节 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分类检验	89
第四节 承接国际外包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103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评论	123
第五章 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转型	125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	125
第二节 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性	134
第三节 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转型	139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与评论	154
第六章 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156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内生发展的经验研究	156
第二节 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内生性	190
第三节 本章小结与评论	197
第七章 全书总结与政策建议	200
第一节 本书主要结论	200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03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7

序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技术亟待提升,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越 3 000 美元,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从制造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因此,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因此,讨论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与世界经济形势相联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和国家分工的深化,国际外包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发展趋势,因此,对国际外包与中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的研究只有零散的片段,缺乏系统的讨论,并且在已有的研究当中,西方学者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从发达国家的立场来对国际外包进行研究,但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处于被动的接包地位,本书的目的是讨论国际外包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将研究视角限定于承接国。站在承接国的立场上,我们不禁要问:国际外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理论机制是怎么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就开始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了,那么,就中国经验来看,国际外包具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一步,在中国所面临着的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外包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什么类型的国际外包活动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有利?

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本书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章,我们首先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引出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指出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对本书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对研究

对象做出说明,并对全书的逻辑结构、行文思路、研究内容进行安排,最后,我们还对本书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

第二章是全书研究的基础,我们首先对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两大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论,然后,从分工出发建立两者的理论联系。本书指出,产业结构的本质在于分工,同时,国际外包则是国际分工在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形态,因此,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共同理论根基。

第三章,我们分别从理论上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两个不同层面对国际外包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从产业内来看,国际外包会从收入分配、要素配置结构、产业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内贸易结构等多方面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从产业间来看,国际外包则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劳动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等四种机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我们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按照第三章的思路进行研究,我们在本章重新组织了一个研究思路。首先,我们对国际外包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考察,并挖掘了其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因素;接下来,我们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最后,为了契合本书的研究主题,我们还对国际外包是否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增长速度是相当之快的,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促进这种增长。国际外包促进了中国收入的增长,但是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拉大了高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并且,国际外包也没有对中国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提升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说,中国承接国际外包则是有益的,它对中国一部分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总而言之,就中国经验来看,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是相当复杂的,整体上,我们仍然应当继续努力推动国际外包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对问题进行了升华,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了国际外包与承接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理论联系。在进行理论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对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从理论和经验上进行了总结。鉴于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目标主要是从制造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发展是服务经济的主要

特征,因此,我们还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内生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 Long 等人(2004)模型的一个改进,我们分析了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外包对承包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服务外包对承包国的影响也与服务企业的市场结构是相关联的,但是,整体上两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都具有推动作用。

第六章,我们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我们首先对服务业进行了界定,然后,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对产业结构的内生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讨论,最后,我们利用 SVAR 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外包在产业结构内生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内生性在不断增强,但是,这种内生性的变化存在许多的扭曲,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没有很好地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国际外包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影响具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这一点在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从长期来看,制造外包的承接对于生产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是更大的,这意味着承接国际制造外包其实从长远来看是更有利于承接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并且承接国服务业受益的程度比制造业还要大,而服务外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性也有一个较长期的影响,但是,最终会消失不见。

第七章,我们对全书进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经过 30 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 645.2 亿元发展到 2009 年的 340 506.9 亿元,增幅高达 92.4 倍,人均 GDP 也由 1978 年的 381 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25 575 元,年均增长 2.1%。^①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2009 年中国人均 GDP 按美元计算为 3 744 美元(2009 年价格),按照产业结构的经典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超过 3 000 美元,该国就应当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应实现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在产业结构的构成上,197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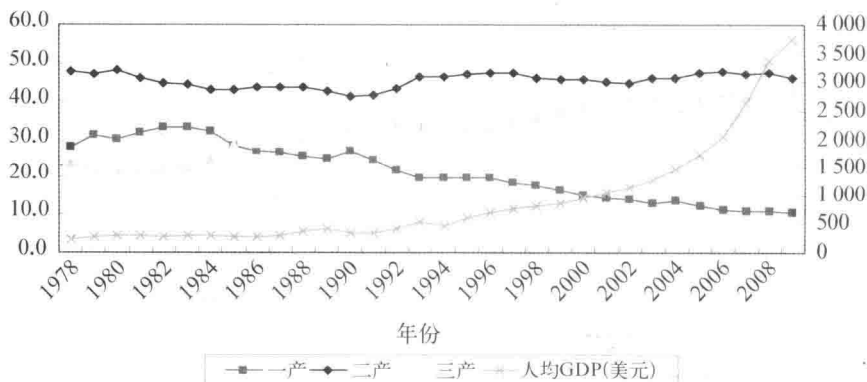


图 1.1 1978—2009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① 年均增速按照(末年值-初年值)/初年值/年数 $\times 100\%$ 计算,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 28.2 : 47.9 : 23.9, 这一比例在 2009 年达到了 10.3 : 46.3 : 43.4, 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 第二产业大致维持了原来的水平, 一直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而第三产业则有一个渐进的升值, 但是, 仍然略低于第二产业, 因此, 不论是在人均 GDP 上, 还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上, 中国均已经进入了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阶段。

事实上, 中国经济也确实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国多年的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基础的,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成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我们对 2002—2006 年制造业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测算, 结果表明制造业的增长中资本的贡献达 63.04%, 劳动力的贡献为 26.23%, 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仅为 10.72% (郑若谷, 2009), 这种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 并造成了许多的问题。首先, 中国制造业的高投入是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 而中国的资源有限, 这一方面使得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 同时又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 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奠定是以劳动密集产业为基础的, 这有三个影响: 第一, 它以大量的低劳动力人口消耗为基本特征, 但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 低成本不再, 而且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 能够成为产业工人的人口也逐渐减少, 因此, 继续强力推进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已难以为继; 第二, 劳动密集产业技术要求较低, 因此, 成就了一种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而且造成了产能过剩、竞争过度的不良格局 (刘志彪, 2008), 因此, 打破产业链低端锁定成为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困局。再次,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一个严重不足就是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紧密, 尤其是忽视了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 造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现象, 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困难。总而言之, 中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产业结构处于价值链低端、服务业严重滞后成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 产业结构转型是当务之急, 这也是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 中国的经济成功源自改革开放, 也就是说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前提, 而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在 GDP 中的比重 1978 年不足 10%, 到 21 世纪后达到了 50% 以上, 甚至一度超过 60%, 可见, 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然而, 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当中,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国际分工的

深化和资源的全球配置。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工具等硬件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信息和互联网等技术的推广,分工由产业间延伸到产业内和产品内,从而使得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可以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行为和组织方式。分工深化导致了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原先以最终产品为主的贸易转向了以中间产品为主的贸易。就中国而言,1981年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仅为6%,而到21世纪之后这一比重高达40%,加工贸易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新的名词为国际外包,国际外包现象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并开始向服务领域延伸,2006年,国家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联合推出了外包的“千百十工程”的发展战略,旨在把中国建设成为服务业外包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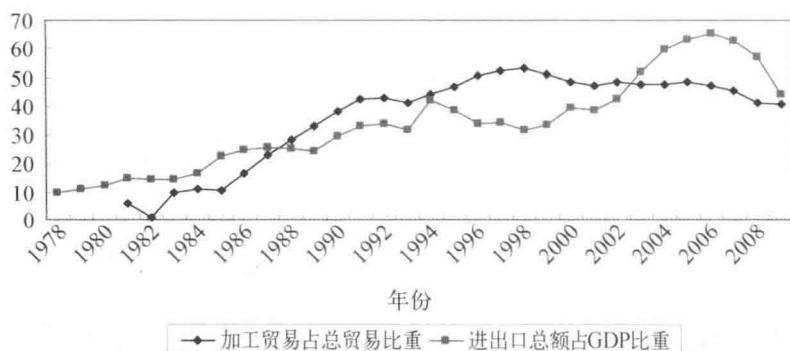


图 1.2 1978—2009 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

二、问题提出

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是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对外开放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世界经济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本质在于全球分工,全球分工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外包这种新的贸易形态,并且,中国在政府层面上也启动了一些外包战略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即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事实上,国际外包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其有不少研究,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外包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国际贸易

的模型或者产业组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①而它与产业结构是两种典型的不同经济领域,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西方经济体往往是处于一个发包的主动地位,而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往往是作为承接方融入全球的,西方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基于自身利益,把研究视角着眼于自身,因此,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来研究国际外包问题就显得相对不足。站在我们自身的立场上看,这种全球性的外包活动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机制是怎么样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也有30余年的时间,中国在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当中是伴随着国际外包这一经济活动的,那么,从经验的角度上讲,国际外包具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一步,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外包在其中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国际外包自身也是在不断演变的,早期世界经济更多地流行的是制造外包,而服务外包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什么样的国际外包行为对于实现结构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加具有推动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理论和实证的检验。这些都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廓清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

三、研究意义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书拟从理论上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地讨论,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外包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多维度的实证检验,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分析上,第一,由于当前的研究中,外包和产业结构是两个分离的领域,现有文献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多是零散的分析,很少进行系统的讨论,本书是首次系统阐明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为当前的国际外包战略提供一个理论支持。第二,本书在梳理产业结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结构研究应当从其本质特征——分工出发,而这一点正是国际外包这一现象诞生的根源,由此,本书为外包和产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源泉,这也为本书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第三,本书在Feesrta和Hanson(1996)以及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的开创性

^① 有关国际外包的研究文献我们将在第二章进行详细讨论。

模型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证明了外包是如何对接包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影响的,这有助于澄清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认识。第四,本书还借鉴内生增长的思想将服务业的增长内生化,讨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增长的内生性,并在 Long、Riezman 和 Soubeyran(2004)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考虑了外包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增长的这种内生性之间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认识。

在实践上,第一,本书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盲点,但同时该问题又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重要热点问题,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本书在检验外包的结构效应时,从需求(收入)和供给(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个维度,对外包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的另外一种方式 FDI 进行了比较,这对我国政府在指导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结构调整政策中如何利用 FDI 和国际外包两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本书对国际外包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影响,并从技术溢出和生产率两个重要的方面来考虑,检验了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这对于中国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和改善产业绩效途径上均有重要意义。第四,本书还将外包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和检验,这对于中国制定适当的外包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都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述

一、国际外包

(一) 外包

外包最早来自工程学。《韦氏在线词典》将其界定为“将制造和生产工作转包或分包给外部公司,尤其是那些外国或非工会公司”的行为,《美国传承词典》将外包解释为“为了节省成本而从一个供应商或厂家获得服务或产品,例如用于一部汽车的零部件”。《韦氏在线词典》的定义表明外包这一现象源自制造业的事实,但是明显地将外包限制在了制造领域,而《美国传承词典》则明确指出,外包既包括生产行为,也包含服务行为。

两种词典的解释显然是对外包这一现象出发的,随着外包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外包内涵的重视,Quinn 和 Hillmer(1994)将外包简单地理

解为一种外部资源利用,但是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没有反映出外包的完整含义;Corbett(2004)指出外包是企业将内部的工作或服务转移给外部供应商的过程,因此,外包就是将之前由企业内部提供的生产或服务功能转而向外部供应者提供或购买(Monczka & Trent, 2003)。在此基础上,埃森哲(Accenture)从价值层面将外包划分为四级级别:基本技术外包、商业应用程序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业务改造外包,并将外包定义为“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完成的工作”。

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于外包从其他的角度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外包也存在其他的许多在某种程度上的可替代术语,如从生产的角度上讲,有“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Dixit & Grossman, 1982)、“分割生产(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Jones & Kierzkowski, 1990)、“生产的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Feenstra, 1998)、“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 et al., 1998)、“国际生产分享(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Ng and Yeats, 2001);从地区区位的角度讲,有“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Bhagwati & Dehejia, 1994)、“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Leamer, 1996);从价值链的角度讲,有“价值链切割(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Krugman, 1996);从分工的角度讲,有“媒介内贸易(intra-mediate trade)”(Antweiler & Trefler, 1997)、“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Arndt, 199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外包这一现象进行了刻画,但是,本书着重强调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本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采用“外包”这一术语。^①

(二) 国际外包

根据外包承接双方的主体是否属于一个国家,可以将外包分为国内外包(Domestic Outsourcing)和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Foreign Outsourcing)两种。前者又称为在岸外包(Onshore Outsourcing),对应地,后者也称为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如果承接双方均属同一国家,则成为国内外包,反之,则属于国际外包,这实际上是对相同的生产组织模式从国家层面进行了一个区分。基于这一定义,国际外包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内的国际外包,即中间投入品的国外供应商与国内委托方属于同一企业,产生的是企业内贸易;另一种是关联企业(arm's-length)的国际外包,即中间投入品的国外供应

^① 事实上,本书在后文一直沿用的是国际外包的术语。